

在80万言的长篇巨制《第三代》问世之前,《八月的乡村》是萧军不折不扣的文学名片。1935年,凭借这一部被鲁迅收入“奴隶丛书”而“非法”自费印行的小说,被东北陆军讲武堂开除的这位辽宁小伙子,获得了文学界的接纳。这一年他28岁,或许算不上年少成名,却也可以踌躇满志地展望他的文学前程了。

凡14万字、14章的《八月的乡村》,是萧军1934年动笔于哈尔滨、完稿于青岛的,小说的书写对象是他生于斯长于斯却又不得不离开的东北沃野。如果仅仅描摹了黑土地的人情风物,恐怕很难获得那种洛阳纸贵式的轰动效应;首版迅速售罄,一年之内重印9次。此书成功的首要奥秘,是正面讲述了“东三省被占”的事情(鲁迅《田军作〈八月的乡村〉序》),深深触动了中国人(首先是东北人)埋在心中的巨大痛楚,从而积极履行了“东北作家群”领军人物的艺术使命。《八月的乡村》确实无愧于乔木在1936年2月25日做出的高度评价:

《八月的乡村》的伟大成功,我想是在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,新的人物,新的背景。中国文坛也有过满洲的作品,也有过写战争的作品,却不曾有一部作品是把满洲和战争一道写的。中国文坛上也有许多作品写过革命的战争,却不曾有一部从正面写,像这本书的样子。

二

东三省是中国最早落入日本之手的河山,东北人民也因此成了受日军蹂躏最久的同胞。日本悍然发动的侵略战争,无情地摧毁了广大农民相沿日久的生活秩序,于是就连“自由的咬着烟袋去耕地”这样“可怜的题目”,也成了人们遥遥无期的幻想,就连“小瓦罐里的半罐米”这么琐屑的东西,也成了人们衷心忧惧的对象。

小说中对于日寇暴行的揭露和鞭挞,凝聚为松原太郎强奸李七嫂的描写。萧军独具匠心地选择新兵为描写对象,充分展现了天皇崇拜、武士道精神的巨大毒害。在自上而下的兽性氛围中,那些人性未泯的初入伍者,会无可挽回地做出灵魂的自由落体运动,由人堕落为兽。“多少不愿意为天皇打仗的少年兵”,“在命令到达的时候,也是认真的踏起步枪来”。尽管松原的爱人芳子曾告诫他:“你打仗不要弄支那女人哪!这就够悲惨了!”然而松原太郎抵挡不住另一种随时随地的耳提面命:“在满洲地方,在打仗的时候,长官还管这些吗?长官也一样弄的。”兽性战胜了人性,松原太郎把李七嫂的孩子残忍地“抛在沟下的石头上”,奸污了李七嫂。

东北人民的受苦受难,与奉军的“不抵抗”关系甚大,《八月的乡村》在第六章《这样一个女人》中,借陈柱司令之口,对其进行了愤怒的抨击:“后来,张作霖父子又来管辖我们……他们养兵,打仗,造‘兵工厂’……这是为的保他们自己的天下……谁骗我们说是卫国——打日本人——现在日本人真的全来了……他们却一枪也不放的就跑了……”“应该打仗的王八们跑了。遭殃的是谁呢?除开我们老百姓还有谁呢?”

“眼看日本兵一天比一天凶!”“这年头非干不行。反正不是你死,就是我活!”生死之间,东北人民无奈而坚毅的选择,是摒弃对不作为的政府的幻想,挺身自救,组织队伍,武装反抗。义勇军、自卫军、人民革命军纷纷涌现,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。《八月的乡村》便是以作家舒群提供的磐石游击队的真实战斗事迹为原型写成的。在不算很长的篇幅内,在“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”(鲁迅《田军作〈八月的乡村〉序》)的不甚谨严的结构中,小说依照时间流程,生动地叙述了一个阶段分明、线索清晰的故事:萧明率领着一支9个人的游击队小分队,从兴

隆镇出发,忍饥挨饿,跋山涉水,躲避敌兵追击,去王家堡子与陈柱司令指挥的人民革命军第九支队会合。会合后,人民革命军又转移到龙爪岗,打下了地主“王三曹操”的庄园。出于整训的需要,又从龙爪岗出发,准备继续转移到东安。

三

萧红的《生死场》“叙事和写景,胜于人物的描写”(鲁迅《萧红作〈生死场〉序》)的不足,其实也是萧军《八月的乡村》的特质。小说为读者提供的是战斗者的群像,力度有余,精细不足。各个人物的性格,基本上是在行军、战斗、执行命令的过程中零散展现、随机暴露的。

小说一开始就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发生在“无边际的桦林”

刻画,这个事实是耐人寻味的,也是不落俗套的,如果对照阅读女作家丁玲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名作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的第15节《文采同志》,这种感觉更分外强烈。这不能不归结为萧军他终其一生坚持不渝、历经各种“改造”都维护如新的知识分子的自觉。正是出于执拗、坚韧、宝贵的知识分子自觉,萧军才没有对萧明形象做丑化、淡化、漫画化处理。当历史走过30年代之后,走到1942,走到1957,走到1966,萧军创作的独立不倚、萧明形象的卓尔不群,自然会更加引人唏嘘。

四

作为革命文艺运动的一分子,萧军当然坚信“兵民是胜利之本”,但是通过萧明形象的塑造,可以看出他决不愿意低估

《八月的乡村》:血写的大书

□张慧强 刘润涛

和“无边际的夜”的行军场景。“一切被窒息在黄昏里一样,谁也不交谈一句话。放弃一般任凭蛙、虫子和溪流占据了这长谷的空间。”“每人的子弹袋全变得空虚了!病蛇般的软垂在人们的脚下。随着人们的脚步在动荡。”在这场物资稀缺、时间紧迫、“死亡在四处筹备着”的行军中,尽管有“不能说的悲伤和疲乏折磨着他”,游击分队队长萧明还是很好地完成了领导者的职责。萧明在全书中最早登场,留给读者的印象,事实上也是最深的。

当又累又饿的战士们惦记着“清凉的水流,袋里的干粮”,萧明这样动员:“无论怎样,明天一早晨,我们也必得赶到王家堡子。”当刘大个子恳求“再歇一刻”,萧明这样回答:“你应该想在白天……徐同志和高同志……被割去脑袋的情景!一定要忍耐,什么困苦全应该忍耐过去!”萧明还反复提醒大家珍惜弹药:“每人应该担心点自己的枪,不要平放在地上,或是碰到石头……”“检查检查自己子弹的数目——”“不要乱放枪,我们的子弹应该每粒全有用。”弟兄们,要当心,现在我们的子弹太少了!”靠他的实际行动,萧明赢得了游击队队员们的充分认可:“萧明,那小伙子也真行,本来是个学生,能和我们一样吃苦,没白念书。”

萧明的形象无疑是比较高大的,尽管还远称不上完美。作家能够把自己常用笔名的姓氏慷慨赋予这个人物,似乎并非偶然,应该说分明流露了萧军对其的欣赏。事实上,就连一些比较显豁的缺点,例如面对战友遗体“无尽止地流着泪”,例如发出枪毙汉奸地主“有必要吗”的疑问,例如苦思“什么时候才可以避免了杀人啊”,例如与高丽姑娘安娜的暂时分离令其无限痛苦乃至“将枪口抵紧太阳穴”,例如自我谴责“我这样人对于一个真正革命队员的要求,还差得很远”,也都不影响作家对萧明的偏爱。萧军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,其恩师鲁迅的警句“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,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”(鲁迅《战士和苍蝇》),或许在其心头每每萦回不去。

在一支以文盲、半文盲为主体的非正规部队里,一个知识分子,作为队伍的中层干部,得到了正面的塑造和较为充分的

狭义的“兵民”之外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,同时,按照一种“一以贯之”的理性态度,他也绝不愿意把作为“胜利之本”的“兵民”写成完人和圣贤。于是,在萧军笔下,就出现了一群真实可信、有血有肉的农民战士形象。

他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马列主义理论修养,对于“革命”、“新世界”这些超出他们往日生活经验范围的事物,充满了糊涂不清的认识。有的人懵懂地期盼着:“只要一赶跑日本兵,‘新世界’马上就来!”有的人隐约地质疑着:“我不大相信什么‘革命’马上就能来的。‘革命’来了,我还是我啊!”有的人微微地恐惧着:“‘革命’和当兵是一样的危险!全要赌生命!娘的,全要赌生命!”有的人不甘心地叹息着:“俺们这样的大老黑,革他娘的一辈子命,把自己革死了,也不会有人爱”。有的人不恰当地联想着:“现在革命了,也许‘命’革完了,大家就全有了老婆了。革了命老婆就可以不用钱买的啦”。有的人不准确地阐释着:“革命就是把从祖先就欺负我们的那些臭虫们,全杀了;把现在东三省的日本兵全赶跑了,剩下田地我们自己种。我们不再纳粮、纳租、养活那些白吃白喝的臭虫们”。

比起理念上的糊涂认识,行动中的纪律缺失尤为致命,这在游击队唐老疙瘩身上有突出的表现。他在战斗间隙,不打招呼,独自行动,去和情人李七嫂约会,生物本能压倒了革命理性,战士品格让位于游民习气。唐老疙瘩为了救李七嫂,没有及时撤退,牺牲了日军枪手,未能在抗战中尽更多力量,这似乎是萧军为其设计的“以死赎罪”的不甚妙妙的结局,更是陈柱司令强调纪律的如山铁证:“譬如这次铁鹰队长同志,败仗了,唐同志和其余同志们的死伤……这是同志们忘了‘纪律’!没有重视和实行革命军的‘纪律’!……我们自身若没有铁一般的纪律,是不能和我们的敌人斗争的!”

对于这样一支非正规部队来说,特别需要合格的乃至杰出的各级干部。小说精心塑造的两位干部是陈柱司令、铁鹰队长。陈柱司令的妻子、孩子死于日军之手,他身负国恨家仇,斗争格外坚决。他对于作恶多端的地主王三东家夫妇毫不手软,下令将其处决,当萧明提出质疑:“枪毙他们必要吗?”他简短

杨三的背叛,也写出了胡子的苦衷:“上马容易下马难”;另一方面,江湖世界在作品中也逐渐淡去,尤其是萧军在延安续写的部分:土匪在绑架杨承德之后,便在官军的围剿下日渐式微;而萧军在1950年所写的部分最后部分,江湖的世界已经完全消失。江湖世界作为终极的理想世界,是民间的想象方式,而实现这个理想的途径,倚赖的是个人英雄主义。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,终极的理想世界是共产主义,历史主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,尤其是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,毛泽东对文艺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。在延安时期的萧军,正是经受着这两种不同话语之间的交锋,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,他有以毛泽东思想“改造”自我的尝试,如在1942年6月的一篇日记中他表示:“在文学上由革命的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,到革命的古典主义,将以鲁迅的战斗精神,毛泽东、朱德的忍耐精神以及马列精神方法,形成我的新英雄主义精神,以贯穿我一生。”在这种新的话语中,江湖世界自然失去了合法性而逐渐淡出,但萧军的自我克服却并不那么彻底,具体到《第三代》的江湖世界来说,则是他努力消除了江湖世界里的土匪,但却保留了江湖世界的精神,这种个人主义精神正是他后来屡受批判的根源之一。

四

江湖世界的消失,是萧军思想转变的症候之一,但只是作品中矛盾的一个方面。《第三代》的创作时间跨度长达14年,萧军所面对的问题以及他解决问题的方式,前后都有相应的改变,这使小说缺乏一个整体性视野,鲁迅评价《八月的乡村》的话——“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”,也可用来评价《第三代》,这部小说虽有史诗宏阔的场面,但缺乏史诗的深度和方向。

在小说的第一至第四部,作者首先展开的是凌河村的风土人情:“这个村庄,没有酒馆,也没有吃茶的地方,这里的人们不大喜欢喝茶,也不大喜欢喝烧酒。除开赌博和打猎以外,在冬天,人们唯一的趣味就是盼望能够发生一点值得谈论的谣言,即或是为了这谣言而发生一两场决斗,也觉得是分内的勾当,这总是比一条冬眠的虫似的常僵卧着要有趣味些。”

而全村人围着讲故事,拉胡琴的老人的场面也是如此,展开的都是一幅东北农村的生活风俗画。但为了突出阶级之间的矛盾,作者越来越强调农民与地主杨洛中之间的紧张关系,值得注意的是,反抗杨洛中的四个家庭都是自耕农,土地问题在小说中始终没有被提及,村民与杨洛中之间的矛盾,主要是由土匪推动,杨洛中因将与土匪有勾连的农民投入监狱,以及为了剿匪而征用劳动力,这才使得村民有所不满,杨洛中的形象反而因此变得模糊起来,这也是为什么小说中反抗的群众除了井泉龙、林青等四个家庭外,其他人并不积极,几次反抗杨洛中的群众运动都草草收场的内在原因。

在小说的第五到第八部,小说转向了都市。因为汪大辫子等人来到都市是为了逃离凌河村,所以作者先描写农民汪大辫子、翠屏和林青等人如何学会在都市生存,但紧接着便引入了对城市的道德批判,除以林青的口吻谴责责

有力地答道:“必要的,没有什么理由,再留他们生活下去——好,另换一位同志执行吧!”由此可以看出,陈柱司令显然比萧明更懂得战争与革命“火与剑”的本质。在这支“政委”暂时缺席的队伍中,陈柱司令还担负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职责。因为斗争的需要,他耐心劝说热恋中的萧明、安娜暂时分开:“目前我们的任务……比恋爱还更要紧些!……不要为恋爱动摇了信仰,软弱了意志……”在祭奠牺牲战友的场合,他抓住时机,慷慨陈词,大力强调革命队伍应有的组织性、纪律性,取得了不俗的教育效果。

仅有陈柱司令这样居于队伍顶端的领导者还是不够的,还需要铁鹰队长这样位于队伍中层的指挥员。铁鹰队长出身农民,“当过兵,当过胡子”,有“高高的身材”,“手枪挂在腕子上,俨然似一只没有翅膀的‘鹰’。”“铁鹰”的绰号,是象征他的猛鸷和敏捷。人如其名,“说话总是这样斩绝。他不等谁的理解。当他执行命令的时候,他会变成命令的本身。”他杀起人来向是没有温情的,他严厉的如官长一样对待他的部属。

正是围绕着陈柱司令、铁鹰队长这样的中流砥柱,小红脸、刘大个子、李三弟、李七嫂等等出身、秉性、能力各有不同的战士,结成了混凝土一般的战斗集体,前仆后继地负着守土之责,同仇敌忾地尽着御侮之义,不屈不挠地“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,现在和未来,死路与活路”(鲁迅《田军作〈八月的乡村〉序》)。

五

1936年3月15日,混迹沪上文坛的张春桥,以“狄克”为笔名,在《大晚报》副刊《火炬》上发表文章《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》,文中说:“《八月的乡村》整个地说,他是一首史诗,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,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。有人这样对我说:‘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,就是由于他们感觉到田军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学习,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,这部作品当更好。技巧上,内容上,都有许多问题在,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?’

同年4月16日,鲁迅读了狄克的文章,他愤怒地写了《三月的租界》予以严厉驳斥:“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。假如‘有人’说,高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,否则,他的作品当更好;吉斯不该早早逃亡外国,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营里,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。倘使有谁去争论,那么,这人一定是低能儿。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,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,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‘丰富了自己’,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。”

在文中,鲁迅进一步指出,狄克言论的实质是提倡“坦克车正要来,或将要来了,不妨先折断了投枪”。鲁迅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立场:“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,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。”

同年5月,张春桥从《夜莺》月刊第1卷第3期上读到《三月的租界》后,托内山书店转交给鲁迅一封信。信中与鲁迅商榷:“敬爱的先生,我们是不是有了投枪就不去制造坦克车呢?就是不制造坦克车的话,在投枪制出以后我们是不是要经过大家底研究和改进他呢?”言语中颇有不服之意,但是,他也不得不承认小说的巨大价值:“在这连投枪也很少见的现在,对于《八月的乡村》这样的作品,是应当给予最高的评价的。”

作为萧军的恩师,鲁迅成功地保卫了《八月的乡村》,这是鲁迅光耀千古的文化功勋的一部分。其实,即便鲁迅不去保卫,《八月的乡村》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,仍然很难被任何人的如簧巧舌和不实之词否认、动摇、抹煞。《八月的乡村》堪称一部以血书写的不朽之作!

《第三代》的两个世界

□刘奎

20世纪30年代中期,东北作家群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在内地文坛兴起,无论是他们作品中东北原野的宏阔,还是被迫流亡的悲愤,都给内地的文坛注入了活力,萧军正是这其中的一位重要作家。萧军的创作以小说为主,而《第三代》则是继《八月的乡村》之后的又一部力作。

《第三代》近80万字,为完成这部著作,萧军前后断断续续创作了14年(1936—1950),其间他辗转于上海、青岛、武汉、延安等地,作品也先后发表于《作家》《七月》等刊物,直到1950年春季他到北京,才把最后一部分写完。这部作品对萧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正如他在1955年该书以《过去的年代》为题出版时所说:“从开始构思、写作,到今天出版,这小说几乎缠了我近20年!它跟随我流转各地,也陪伴我经历各种各样的生活。记得1945年由延安到张家口,一匹马驮着它和别的一些书、稿,路经一条河,马儿们竟在河里打起架来,所有的箱子就全落了水。幸亏这部稿子被油纸包裹得比较好,虽然浸了些水,倒还无碍,今天能得出版——这虽然是一件小事,但对我个人来说,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——也欢喜,也有点辛酸!欢喜的是,从此我将不再担心着它们的毁灭或散失;辛酸的是,这个和我若干年同甘共苦患难的‘伙伴’,真的竟离我而去。”可见这部小说对萧军的重要,也表明这部作品是了解萧军的创作和走进那个时代的重要媒介。

《第三代》的艺术价值,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,在1937年由“文化生活出版社”发行第一、二部的单行本时,常风就将其评价为“一篇雄浑、沉毅、庄严的史诗”,并展望“在第三部里将要揭开更雄浑、更沉毅、更庄严的一幕”。李健吾则从社会意识的角度给予了肯定,他认为:“这种强烈的社会意识,到了作者的《第三代》,虽说如今才有两卷问世,我们已然感到它的力量和作用。”该小说确实具有史诗的气度,是围绕东北的一个叫凌河的村子展开的一幅乡土生活的风俗画卷,这里面同时也充满了仇爱、生死和哀乐。

二

就小说的主要情节来看,小说并无中心的人物,主要是围绕凌河村四个普通家庭——井泉龙、林青、汪大辫子和宋七月——与村长杨家之间的恩怨展开。小说从寡妇林四姑娘的生

产开始,小孩的实际父亲杨三失手打死了林四姑娘的婆婆,村长杨洛中因之前杨三屡次拒绝为他效劳,而将杨三拘捕并打算将他送官,但土匪劫走了杨三并放火烧毁了杨家的柴垛,打死了炮手朱三麻子。矛盾从此开始,官军很快就抓捕了林四姑娘的父亲林青和曾为土匪送信的汪大辫子,这却遭到了老义和团井泉龙的反对,他领着村里人去保释却未成功。面对土匪的威胁,杨洛中要求官家在村里新设“保安分局”,并开始编练团丁,却将负担转移到村民身上:“勒令着凡是一块地以上的农户,就应该有一支步枪,一亩地以下的要有一支打鸟枪或洋炮,没有地的‘花户’或佃工,他们应该加一倍分担着钱粮。”这种政策再次遭到井泉龙的反对,他认为胡子大多是被逼无奈,只有田多的地主才怕胡子,而“我们仅仅有那么拳头手掌大的地,并不必怕他们,甚至觉得‘把闺女给了胡子作老婆也甘心’,双方的矛盾因此进一步加深;新来的巡长欲对汪大辫子的老婆翠屏图谋不轨,在与宋七月商议之后,翠屏去羊角山投奔了土匪。不久之后土匪再次袭击了杨家,并绑走了杨洛中的次子杨承德,杨洛中先是与段巡长勾结,将暗中通匪的宋七月、宋八月两兄弟和井泉龙等人投入监狱,但在接到土匪送来的信和信物(杨承德的一只耳朵)之后,他只得用钱赎回杨承德,杨洛中也因此一病不起。后来林青的儿子林荣从俄国回来,将全家搬到长春;汪大辫子出狱之后,也随即和翠屏来到城里,从此打算在城里谋生,但没想到都市只是另一个凌河村,虽生活处境有所改善,但随着杨洛中的长子杨承恩要开办工厂,林青、汪大辫子等人所在的爱民村要被迫搬迁,林青又与村民一起上诉,但均未成功,汪大辫子最后带着妻儿回到了凌河村。

除强调矛盾的一面之外,作者还写出了乡土世界的自足性,这包括人们的生活、信仰和娱乐等方面。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林青,虽经常以反抗的姿态出现,但更精彩的往往是拉胡琴的时候,如他沉浸在音乐中的样子:“老林青的头勾垂着,他把整个的灵魂和呼吸全搅荡在那琴声里。这拉的应该不是胡琴,发出的声音不是胡琴的声音:拉的是他自己的每条神经纤维在震响。”而他的唱词更是乡土世界朴素的价值观:“凌河的流水呀……东又东。/山坡上的草……/一年老了一年生, /一年反比一年青!……/你家富贵我贫穷, /富也不常富, /穷也不常穷, /太阳不在一个家门前红。”这正是村民自我调节以获得精神满足的生活方式。

萧军固然在做人方面保持了自己一贯的江湖风格,在《第三代》这部作品中却没有完全做到,虽然江湖一直是一个存在于现实之外的想象的世界,但土匪却使萧军早早地“消灭”了。一方面,萧军写出了江湖内部的纷争,如

萧军与地主杨洛中之间的紧张关系,值得指出的是,反抗杨洛中的四个家庭都是自耕农,土地问题在小说中始终没有被提及,村民与杨洛中之间的矛盾,主要是由土匪推动,杨洛中因将与土匪有勾连的农民投入监狱,以及为了剿匪而征用劳动力,这才使得村民有所不满,杨洛中的形象反而因此变得模糊起来,这也是为什么小说中反抗的群众除了井泉龙、林青等四个家庭外,其他人并不积极,几次反抗杨洛中的群众运动都草草收场的内在原因。

在小说的第五到第八部,小说转向了都市。因为汪大辫子等人来到都市是为了逃离凌河村,所以作者先描写农民汪大辫子、翠屏和林青等人如何学会在都市生存,但紧接着便引入了对城市的道德批判